

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的社会流动

张彦台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 邓小平理论研究所, 河北 石家庄 050051)

摘要:借助于社会流动的分析维度,可以进一步揭示特定历史时期牙商群体的动态特征和一般趋向,为牙商群体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民国时期,华北牙商形成了上下流动、职业流动和区位流动的现象。从本质上讲,牙商的社会流动是牙商群体社会作用日益凸显的必然结果,并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牙商阶层在近代发展演化的历史趋势。

关键词:民国时期;华北;牙商;社会流动

中图分类号:K 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4)01-0023-05

牙商是中国传统的商业中介,指的是在近代化以前的城乡市场中,从中说合构成交易、代客买卖或为买卖双方执掌度量衡器而从中收取佣金的居间商人。在历史上,牙商也被称为驢侩、牙人、牙郎、牙侩、牙纪、经纪等。民国时期,政府改变了压抑商业、歧视商贾的态度,提倡实业、鼓励商战。在此背景下,牙商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指示器,社会流动是社会结构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一。社会流动指的是社会个体或群体从一个地位向另一个地位的转移,包括身份、职业、地理位置、阶级、阶层关系等的变动。以牙商的社会流动作为本文的研究基点,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长期以来,对牙商群体的地位、作用及其历史评价始终是一个饱受争议的焦点问题。在文献史料和学者的著述中,既有对牙商的褒奖和赞赏(为减少费用而出现的市场分工、促进市场交易有效率的进行、中外贸易重要的纽带和桥梁),也不乏对牙

商的指责和诟病(阻碍商品经济发展、不必要存在的中间环节、无罪也该杀的社会群体)。因此,对这一问题所“纠结”的任何方面有所突破,都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其二,牙商群体的研究成果颇多,但研究内容多以该群体的固态研究为主(即牙商的数量和种类、社会职能、经营纠纷、历史地位及在不同历史时期牙商的法律法规等),尚未有从社会流动角度进行学术研究的。借助于社会流动的分析维度,可以进一步揭示特定历史时期牙商群体的动态特征和一般趋向,从而为牙商群体的深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一、华北牙商的上下流动

社会流动有着不同的类型。按照社会流动的方向,社会流动可以分为: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向上流动的基本形式一般有两种:社会群体进入一个较高的社会阶层或成为与这个阶层的原有群体相平行的群体;个体从较低的社会阶层渗透进入较高阶层。

收稿日期:2013-09-03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批准号:HB13LS007)

作者简介:张彦台(1977-),女,河北宁晋人,历史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社会史研究。

牙商个体的向上流动。牙商所体现的向上流动表现为从一贫如洗的农民、学徒或小商人发财后成为大资本家或大富豪。华北地区各省中不乏这样的案例。如天津牙商朱德禄、高望堂、王云贵等人的佣金都在400万元以上。山东掖县沙河镇杜家开设的牙行资本总额达200万元。寿光巨商孙元高开设的牙行资本总额达100余万元。借助于典型个案的实例分析,有助于更直观地了解牙商向上流动的过程和速度。

高必明是山西省粮食牙商个体向上流动的代表。高必明,家境贫寒,十几岁时是个店铺的小伙计。1918—1919年间,高开设一家粮食牙行,由于善于经营,便又在1934—1935年间,增开了两家粮食牙行。高必明服务态度好,除了代客经营本地杂粮外,还为晋南、石家庄、邯郸等地的多个客商代卖粮食。经过十几年的经营,高必明从一贫如洗一跃成为逐鹿商界的富贾,他在太谷县城有7座院落、仓库300间,并在祁县东观、太原开分店数家,拥有了“太谷粮王”的称号。

孙东园是河北省牙商中由一个学徒向大富豪流动的典型案例。孙东园,直隶(今河北省)丰润县人,因家贫,在某货栈学徒。1906年他与朋友等三人用3万元开始从事牙商业,以代销唐山一带的白条猪肉和代客办理转运为主要业务。1912年以后,改进经营管理办法,开拓代客销售山干货、棉花、粮食、皮张等多项业务。孙东园所经营的同和兴股份有限公司到1930年以后,已发展成为各业俱全的综合性大牙行,利润已高达100万元之巨,客户遍及全国。

慕官晟是山东省牙商中从贫农到百万大富豪的代表。慕官晟,世代务农,因靠种地致富毫无前途,便弃农经商。从成为牙商开始,慕便向百万巨商迈进。1922年慕主持的牙行,开业“资产总额仅在1万元左右”^{[1](P29)},以替客商代办货物以赚取佣金的现货交易和经营期货交易为主。在1930年代,慕成为了青岛的百万巨商。

从高必明、孙东园、慕官晟身上,我们可以发现牙商个体向上流动的历史轨迹。他们白手起家,励志进取,由贫贱而富贵。

牙商群体的向上流动。牙商群体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体现在其在商界占据的领导地位。民国时期,在山东省济南商务分会中,牙商朱璧斋、王协三分别担任第二届商会会长;牙商王协三、穆伯仁分别担任第三届商会会长;孙郭五担任第六届商会副会长。一般而言,只有经济实力雄厚、品行方正的商界

头面人物才有资格当选为会长或副会长。牙商能够当选为济南商务会长或副会长,恰恰体现了牙商在商界的领导地位。牙商在商界举足轻重的地位还体现在其担任商会会董的职务。在1920年山东济南商埠商务分会27位当选的会董中,便有15位牙商(其中一位牙商还担任了特别会董)^[2]。

牙商在天津市商会中当选会长和会董数量和比例的增长,进一步体现了牙商群体社会地位的上升。民国初期牙商的实力薄弱,在商界的地位低下,这体现在1912年10月和1916年3月天津商务总会会董名单中没有一位牙商。1918年天津商会改选,发放选票统计表中,选票总数1570张,牙商总共得分32张,占2%。此时,牙商已经开始参与商会事务,地位逐渐上升。1920年6月30日,总商会公布了新一任的会长、会董名单,牙商展文忻成为商会会董。1924年5月13日和1927年10月17日,天津总商会两次公布新的会长会董名单(60人),牙商各有3名。1929年,天津干鲜果品业同业公会成立,牙商孙东园当选为同业公会的会长。^{[3](P45~46)} 1934年1月,17位牙商组成了天津市“货栈业同业公会”,此时的牙商群体已经作为一支独立自卫的社会力量出现了。1940年10月1日,天津牙商在商会中所占比例是12.5%,并由牙商刘静山担任商会会长。

牙商群体在商界中由地位低下到担任商会会长职务,体现了该群体整体向上流动的动态过程。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如民国初年,山东省羊角沟成立商会,商会总董和分董分别由益隆西等10家牙行担任。1920年代中期,烟台总商会正副会长由恒祥和、洪泰号两家牙行经理分任,另外43家会董中有近20家为牙商。1948年被推举为“安阳商会会长”^{[4](P2280—2281)}的朱绍清便是开设和记棉花行的牙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烟台的牙商孙蚌亭是全兴义鱼行的经理,而且兼任捷敏冰厂经理、鸿成兴协理、协成义协理、蚌春兴名誉经理,还任鱼业公会会长、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恤养院董事长、日中水产组合董事长等职务。

牙商的向下流动。牙商所体现的向下流动表现为从百万巨商衰败为小商人或一贫如洗。首先关注一下上文提到的高必明和慕官晟两位牙商向下流动的过程。高必明在山西省太谷县粮行独霸一方,名声远播,引起了官方的注意。“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和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十分眼红,先后插足粮行和高必明竞争。粮行牙商高必明一挫于孔家,再败

于阎氏,终至万劫不复。高必明的衰败史说明了牙商向下流动的原因之一,是在与官僚夺利的过程中,牙商是占据劣势的,而慕官晟的向下流动则反映了另外一种情况。正当慕官晟生意兴隆之际,抗日战争爆发,战争期间,慕遭横祸,瞬息破产。1938年1月,日军侵占青岛后,便霸占了慕的大仓库,做为海军军用仓库,使其失去存货之地。1939年春,日伪青岛政权找借口将慕姓的主要办事人员全部逮捕入狱,并向慕勒索巨资,很快慕的主要资本便耗费殆尽,这一场横祸给了慕以致命打击。1940年初,慕官晟彻底破产。

接下来是关于爱国牙商尚广霖主动将生意兴隆的牙行关闭的案例。抗战前夕,尚广霖的生意发展到了繁荣昌盛的顶峰,他代客买卖货物的数量和种类较多,诸如把晋城的铁货、剪刀、琉璃、蚕丝、红果和瓜子等土货通过“鲁豫通”货栈的驮队、担脚源源不断地销往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北京市、天津市等地,又运回来大批的洋货或京货诸如土布、洋油、火柴、红枣和大米等,成为轰动一时的泽州古道上的靓丽景观。山西省沦陷后,日军侵犯晋城,对尚广霖的生意影响颇大。1940年,日军强迫尚广霖为其运送铁板,尚广霖气愤难耐,毅然将生意兴隆的牙行停业,发誓不为日本运货。

战争的因素导致牙商瞬间向下流动的情况,不仅仅体现在慕官晟、尚广霖两位牙商个体身上。实际上民国时期,是中国战火连天的时代,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会使牙商迅速向下流动。如1925—1927年,国内军阀混战,皮行牙商被肆意掠夺和敲诈勒索,邢台皮行牙商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二、华北牙商的职业流动

与静态的、具有很大凝固性的传统社会不同,中国近代是一个动态的、新陈代谢迅速的社会。民国以来,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动,社会阶层之间的职业流动加剧。职业流动指个体或家族由一个职业转移到另一个职业。牙商的职业流动包括牙商向工业企业家、银行家、批发商、实体商或牙商兼实体商等职业流动。

向企业家流动。牙商对近代市场经济下的流通、生产与消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是,牙商资本向工业领域扩展,成为近代工业化进程中的重要资本来源。牙商穆伯仁和苗氏家族便是牙商向企业家流动的杰出代表。

抗日战争前,穆伯仁开设较大的牙行包括:山东博山县的同和泰粮栈、济南同聚和粮栈、济南德兴和粮栈、济南德兴昌粮油店等。在积累了充足的牙商资本后,穆向工业领域扩展,由他创办的工业企业不下十几个,总资本达200余万元。苗氏家族先后在济南创办的牙行业包括4个粮栈,1个炭栈,并以济南为中心,在津浦、胶济两条铁路沿线设立分庄30余处,为全国各地客商代购代销各种粮食,当时苗家牙行内经常汇聚各地客商200余家。靠着牙行业的资本积累,苗氏家族累至千金,富甲济南。其后,由商转工,向工业领域进军,先后创办大型企业数十个,并伸展到西安、南京等地。

除了穆伯仁和苗氏家族以外,还有很多牙商在具备了充足的资本后,向工业企业扩展。天津首家轧钢厂——天兴制铁所(现在的天津市轧钢四厂)的资本,主要来源于牙商。山东济南粮食牙商张采丞创办了济南最早的机器榨油厂和面粉厂。1919年,天津的张良谟、张星樵、张兰舫、于华庭、刘壬三五位牙商联合刘鹤龄等集资30万元成立了天津福星面粉公司等^{[5](P480)}。

向银行家流动。除了向企业家流动外,还有个别的牙商向银行家流动。如:刘子山,一个曾经多年蝉联青岛首富的掖县籍(今莱州)商人,从商早期他以代客买卖草帽辫为业,在有了充足资本后,便由一贫寒农民转变成了一位大银行家。1918年发起创办了青岛东莱银行,随即在济南、天津、大连等地设立了分行,在上海设立了汇兑所。

向批发商、实体商或牙商兼实体商转变。早期牙商的主要职能是介绍买卖,保持着代客买卖的中间商性质。但不少在城市营业的牙商很快就突破了这种经营范围,有的直接经手办货,自营大宗买卖,开始转化为批发商、实体商或牙商兼实体商。1920年代以后,牙商自营批发业务在山东省所占比重呈上升之势,这一趋势在粮食、杂货等行业表现尤为突出。事实上,山东牙商自营批发业务的拓展,已使牙商集中介代理与批发经营业务于一身。

三、华北牙商的区位流动

“区位流动是整个社会流动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许多商人“如果没有在地域上流动,他们在事业上就不可能会有如此远大的发展”^{[6](P269)}。牙商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一个不畏艰难的群体。他们除了在本地代客买卖,促进商品流通外,还穿越省界,在人地生疏的地域落地生根,将生意慢慢做大,

成为在异域富甲一方的商业群体。牙商的区位流动既有利于牙商本身的发展,也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and 商品流通,更有利于促使统一大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形成。

河北省唐山市乐亭县汀流河的刘家有“京东第一家”的称号。民国时期,刘家在外开设的益发合商号,掌控着整个东北黑、吉、辽三省的代客买卖和运销粮食的业务。另外,刘家还在整个东北境内有益发合分支机构一百余处。

河北省祁州(今安国县)僻处内地,交通不便,而药材经手(牙商),“信用之佳,在国内药材界堪称第一”^[7]。从1917年开始,先后来山东省济南市经营中药的牙商,绝大部分是来自祁州的。即便有一二户并非祁州人,但在经营方式上,也都是属于祁州人的方式。在济南的中药业中,逐步形成了祁州帮。

解放前,在甘肃经商的山西商帮令人瞩目。兰州开设的代客买卖的各大行店,晋商称胜。在兰州经商的山西人主要分为上府帮、路南帮和绛太帮三大帮。其中,上府帮主要指榆次、太谷、平遥、介休等县的商人;路南帮主要指临津、稷山等县的商人;绛太帮则是指运城地区的新绛县和临汾地区襄汾县的商人。在这三大帮中以绛太帮为最。解放前,绛太人在兰州最多时达到一万余人。兰州的牙商业基本上为绛太人所把持。

华北牙商的区位流动是一个渐进的历程。在这一进程中,无数牙商打破了狭隘的时空限制,参与到浩荡的外流大军中。这使得当地商风盛烈,职业呈现多样化的鲜明特点,有助于形成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开放型经济。

四、牙商社会流动的意义

民国以降,中国社会内部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动,“士农工商”的金字塔状的社会等级结构被逐渐打破,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加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牙商群体形成了新的社会流动现象,尽管在当时,这种社会流动现象极为有限。从本质上讲,牙商的社会流动是牙商群体社会作用日益凸显的必然结果,并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牙商阶层在近代发展演化的历史趋势。华北牙商的社会流动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有积极的意义。

牙商的社会流动可以激发牙商个人积极进取、努力开拓。在社会结构中,如果社会成员的流动机会非常少,社会成员即使付出了努力也难以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那么社会成员便容易形成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的性格,整个社会也便会变成一潭不流动的死水。从牙商个人来讲,社会流动加强了其个人才能、成就与社会地位的直接联系,使华北牙商可以通过自己的经营活动改变自身的命运和社会地位。牙商的社会流动还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奋发向上的精神,有利于激发牙商的积极性,充分实现牙商的聪明才智。

牙商的社会流动有利于社会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变革。华北牙商的社会流动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传统身份社会及其观念模式,特别是牙商的上下流动和职业流动促进了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在传统社会中,身份等级是社会对个人既有地位和财富合法性的认证,强调先赋性和社会习惯。而近代出现的契约社会则是按照利益关系和理性原则订立规范个人和社会行为的协议。在社会发展中,用契约社会取代身份等级社会的实质是人性的解放,用自由流动取代身份限制,用后天的努力取代先赋资格。

牙商的社会流动有利于社会协调发展。像生物体一样,如果社会不能正常地新陈代谢,其发展便会停滞甚至后退。社会新陈代谢的途径之一便是社会流动。牙商的社会流动有利于在社会上形成合理竞争的机制,优胜劣汰,促使社会更快、更健康、更协调的向前发展。

牙商的社会流动有助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流动首先具体表现为社会成员的个体流动,然而分散的个体流动并不能反映社会流动的整体状况,只有当个体流动扩大化为个体所依附的社会阶层的流动、以阶层流动的形式代表社会整体流动状况时,才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结构变迁的规律性,以及相应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变化的情况。民国时期,华北牙商个体的社会流动带动牙商整个群体跃居社会上层、执商界之牛耳的历史进程,无疑是近代社会结构嬗变的一项重要内容。

牙商的社会流动有利于缓解社会差异所造成的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由于一些先赋因素(如家庭背景)的差异等,加之后天许多人为或非人为因素的制约,各社会群体成员之间总是有差异的,甚至是不平等的,这就或多或少地会造成人们在心理上的失衡。当人们的抱怨日积月累而又没有适当的发泄渠道和调整措施时,就会产生社会矛盾,甚至上升为社会冲突。华北牙商通过主观努力,通过社会流动寻求到了一种相对的平等。因而,可以说牙商的社会流动机制是缓解社会矛盾的安全阀之一。

参考文献:

- [1] 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东工商经济史料集萃(第3辑)[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9.
- [2] 济南商埠商会会长副会长、会董特别会董姓名册[Z]. 卷宗号: 临 77—3—1—8, 济南市档案馆藏.
- [3] 天津市档案馆等. 天津商会档案汇编 1928—1937(上)[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 [4] 河南省安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阳市志(第4卷)[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 [5] 陈真, 姚洛.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7.
- [6] 周荣德. 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 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0.
- [7] 安国牙纪捐局. 经手人反对[N]. 益世报, 1929—10—18(7).

Social status of the brokers in the north of Republic of China

ZHANG Yan-tai

(Institute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Hebe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51, 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status is applied as a research dimension of the brokers in history that varies from upper to lower in vocation and region in the North-China during Republic of China. This is believed to result from the communal feature of the brokers as a trend of development.

Key words: Republic of China; North-China; broker; social status

[责任编辑 周祖廉]